進步的路上

易湘壬

如是我見

歷經磨難的中國足球，好不容易出現了些許亮色。在日前進行的亞洲杯賽上，中國隊小組賽三場全勝，淘汰賽中不敵澳洲，止步八強。

賽後新聞發布會上，主教練佩蘭表示隊員們做了自己該做的，因此沒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佩蘭在採訪中還提到，此戰輸給東道主也確實反映了兩隊在身體和經驗上的差距，中國隊需要做的工作還有很多。亞洲杯結束後，佩蘭將帶隊備戰世預賽的比賽。聯繫當下談未來，佩蘭說：「我們看到了今天這樣的比賽結果，我們看到了澳洲這樣參加過世界杯的球隊，他們跟中國隊比賽時候表現出的一些東西，我們還有很多工作要去做，去打造我們最好的球隊。」

對於佩蘭，球隊內外都對他評價不錯。這個敬業的法國人與之前的國家隊外籍教練有些不同，他不但主動到足協來上班，還吃足協食堂的飯菜。他和過去國家隊的中國教練朱廣滬、高洪波都能融洽地交流。但如果用「隨和」來概括他，則未必確切。在選擇球員這個大問題上他堅持自己的標準，此次亞洲杯賽，有幾位資格佔優的球員就被他的考評剔出。足協原計劃今年國家隊要去美洲拉練，佩蘭不贊成這種勞命傷財之舉，足協只得取消。順便說及，據媒體報道佩蘭團隊年薪不及前任大牌教練的四分之一。看來，那句廣告用語「不買貴的，只買對的」的確道出一條樸素的眞理。

和踢球的小伙子一同進步的還有在場外看球的國人。中國隊進入八強後，雖然外界對於中國男足躋身四強甚至奪冠的呼聲很高，但領隊劉殿秋還是表示：「現在就希望中國男足『放衛星』，有些急功近利。」《中國青年報》及時評論：雖然本屆國家隊無論在技術水平、戰術素養還是精神面貌上都有了很大改觀，但這支隊伍身上還有這樣那樣的毛病，甚至連澳洲、伊朗等球隊的實力也不在我們之下。更何況，要讓積弱多年的國足一朝之間發生質的飛躍，也是不現實的。

可喜的還有，最後一戰的布里斯班現場，在國足輸球之後，中國球迷的表現可圈可點，他們不但不離不棄地爲失利的球隊鼓掌，還打出「繼續努力，不負衆望」的橫幅。離開前他們清理了座位附近的垃圾。網上評論非但不再抱怨，甚至辱罵，更道出暖心的話語：小伙子，辛苦了，快回家準備過年吧。

央視記者白巖松的博客頗具代表性：對目前的中國足球來說，信心與希望比黃金還重要。這屆亞洲杯還應該讓我們收穫一點：一切按規律辦事的話，中國國家隊不至於人見人欺，還是有潛力的。踢的正常與瞎踢相比就是一種可貴的進步。對此，佩蘭功不可沒。足協選對人然後少干涉，球迷更多一些心平氣和也是關鍵。現在的中國男足，正常的水平，應該在亞洲是保八爭六衝前四。低於前八，是自己折騰自己鬧的；立即衝進前四，不現實。能穩定在前八然後不斷地衝前四，才是未來十年內該有的節奏。足球的發展是一個系統工程，而在過去的N年時間裡，中國足球已經欠債太多，要「脫貧致富」，必須腳踏實地從一點點做起並一步步向前，而本屆亞洲杯的可貴之處恰恰在於——這支中國隊讓我們看到中國足球正走在一條正確並提氣的道路上。

足球這項運動，從強度、集體性、觀賞性等方面來看，堪稱十足的「大球」，每四年一次的世界杯賽盛況即不亞於奧運會。亞洲足球落後是現實，頂級的日本隊被國際足聯排名在三十名之後，中國隊則常年在九十名前後徘徊。愚以爲，十年後若中國隊能成爲「五十強」的一員，當屬一個來之不易的進步。我們一方面要向先進學，另一方面自己不折騰，這一目標未嘗不能達到。順便說及，功利體育、金牌體育是要不得的，但「舉國體制」也遭到批判，就實在有些讓人費解了。我看美國籃球的高水平就是舉國體制的產物，人家不但舉全國之力，還借全球之力來邁向輝煌。我們千萬不要倒洗澡水時把孩子也給倒掉了。

小花瓶大警示

商子雍

自由談

剛剛落馬的副省級官員楊衛澤，被爆出一樁劣行：此人在蘇州任職期間，一次到下屬的一個公共收藏機構視察工作，參觀過程中看上了一尊瓷花瓶，於是素有收藏瓷器「雅好」的楊衛澤，直接把這件國有藏品拿走了事。

國有收藏機構裡的藏品是國有資產，容不得任何人化公爲私，據爲己有，這是天經地義的法律底線，但凡成年人，怕是沒有不懂的吧！但楊衛澤居然敢於、也能夠直截了當地將國有藏品拿走了事，乍一看來讓人吃驚，仔細想想卻也並不奇怪。因爲，在中國特殊的文化環境中，不少官員（特別是高官）都或多或少地存有這樣的意識或潛意識：法紀是用來對付平民百姓的，對達到一定級別的高官並無約束力（起碼也是約束力不大）。而現實生活中，「在老子說一不二的這一畝三分地上，誰能把我怎麼樣」的實例，也並不罕見。驕橫的官員，以及對這一類官員約束的鬆懈，無疑會導致老百姓缺乏（甚或失去了）依法監督高官的膽量和能力。要不然，一件平民百姓中的不法分子需要通過鼠竊狗盜等手段，才能到手的國有珍貴瓷器，楊衛澤竟然可以絲毫不用藏着掖着、就那麼大大方方地拿走了呢？事情的後續發展，好像也坐實了楊衛澤的這種「高官自信」。請看：收藏機構的負責人儘管對楊衛澤的行爲感到「驚訝」，當面卻不敢有任何異議；事後，非但仍然不敢依法舉報，還煞費苦心將這件瓷瓶以破碎報銷處理，幫這位高官清除犯罪痕跡（當然，也是爲自己洗清責任）。要不是這一次楊衛澤落馬，不再是高官了，這樁罪案恐怕還會繼續石沉大海、不爲公衆所知曉吧！

面對着這麼一樁高官毫無顧忌地竊取公共財物的醜陋事件，我們不禁要發問：在楊衛澤名下，還有多少以巧取豪奪的手段被他侵佔的公共利益？在公共權力機關中，還有多少如楊衛澤一般品行不端的高官？

當然，不是所有的高官都胡作非爲，但鑒於眼下監督體制的不完善、欠嚴密，在高官群體中可能屬於少數的爲非作歹者，幹起壞事來會顯得特別遊刃有餘。這正如習近平之所言：「牛欄關貓是關不住的，空隙太大，貓可以來去自如。」在光天化日之下毫無羞愧、毫不恐懼、易如反掌地化公爲私，並且在很長時間裡安然無恙的高官楊衛澤，不就是這種情況嗎？看來，如何有效地依法監督、管理高官，的確是進一步深入反腐、淨化官場生態的關鍵所在和當務之急！

一度被楊衛澤非法佔有的，只是一尊小花瓶，但圍繞着這尊花瓶發生的故事，卻能給我們大警示！

戒煙決心

楊繼良

人生在線

最近，內地發布了禁煙令。香港早在八十年代便禁止在公共場所吸煙，但到二〇〇七年，香港還有人發表文章，說禁煙荒謬，是「多數人對少數人的暴政」，「是對法治精神和民主意識的踐踏」，屬於「腦子進水」。到二〇〇九年，香港全面禁煙，高唱「民主、法治」者才噤了聲。五年來，成績很好，足爲大陸禁煙新政的楷模。中國的禁煙令引起了我陳舊的回憶。

我出身於基督徒家庭。星期天在祖父家午餐後，祖母對我父、叔兩人講，「你們兩兄弟呀，香煙少吃點。」叔父接口，「阿姆，阿拉吃得叫關少，只飯後一根。」搪塞過去。其實，他倆都一支接一支地抽，父親每天消耗五十支，當然引起肺氣腫。近七十歲時，醫生診斷說，如果再抽下去，活不過一年了。出醫院，他把口袋裡的那包煙，丟進大門口的垃圾箱。但爲時已晚，勉強活到七十，死於肺癌。數年後，叔父也死於肺癌，剛過七十。照說都不算短壽，但他們其餘弟妹五人，至少活到九十二，最多九十六。兄弟倆，都死於吸煙，各少活二十年。

香煙，容易成癮；要有相當強的意志，才能戒掉。抗戰初，我跟祖父母避難香港，他老人家對生活非常不安，吸上了煙。一年後回上海，在途中（船上）就戒了。他是教會裡的「長老」，不敢給教友有「煙民」的印象。我的弟弟在福建衛生廳當個領導，文革受迫害期間，也吸上了煙。文革後，同事來他辦公室，提到香煙有害，他說，「好，我就戒這支煙」，說罷把手裡的煙在煙灰缸裡按滅，從此不再吸，我很欽佩他堅強的意志。

我十四歲時，少不更事，偷父親的香煙「試試看」，很快就覺得正如廣告上說的，「飯後一支煙」，帶來的「愉悅感」，「賽如活神仙」。那時，日本剛投降，我從販賣美軍軍餉的地攤上，買了一盒只有十支、特別長，牌子就叫「高個子（Longfellow）」的香煙。後來知道，這種煙含的尼古丁特別高，供有毒癮者用。那天飯後，接連吸了五支。頓時天旋地轉，倒在床上，覺得心臟要從喉嚨裡跳出來，想自己大概要死去了。慢慢緩過神來。這段經歷實在太可怕，從此不敢碰香煙。

三年前，我八十歲，動「開胸手術」，居然活了下來。醫生們查房時，有一位參與手術的，對其他人講「他的動脈很乾淨」，我明白他是說，這是我活下來的原因。七十年來，沒有碰香煙，追根溯源，歸功於那半包「高個子」！

近年我在《大公園》發表過一篇雜感，講述二十二年前美國對香煙是否有害的辯論的故事。那時煙草公司還在負隅頑抗，強調「吸煙有害論」並無科學根據；隨着醫學的發展，這已經不成其爲問題，禁煙逐漸成美國人的自覺行動。二十年前，在當地大學的門口，嚴冬時節，有職員三五人圍着大煙灰缸，猛吸香煙過癮。這種場面早已看不到了。我在美國的親友中，吸煙的只有一人，那也是從國內帶來的習慣。

我那現年五十歲的兒子，到了美國以後，爲了謀生，被迫戒煙。他說，回想過去，一支煙在手，很得意：顯得自己很「成熟」。（當然，我明白，「愉悅感」更重要。）據二〇一四年統計，中國內地煙民三億，二手煙覆蓋七點四億。更嚴重的是，煙民不斷低齡化，男性開始吸煙者的年齡一九八四年平均二十二歲，二〇〇二年爲十八歲。年紀小，對香煙的爲害漠然不知也。而且，小學文化男性的吸煙者佔百分之七十一，大學文化者佔百分之五十五。使人感慨大學生的「書都讀到哪裡去了」！這說明雖然識字明理，但學校、社會宣傳香煙的毒害太不夠。二十多年前，財政部一位廳局級官員抽着煙、舒心地對我說，香煙創造了巨額稅收，政府不可能禁煙。如果這眞是當局者決策的依據和所以不宣傳的原因，那眞是鼠目寸光了！本屆政府戒煙的決心，說明當權者務實、明智，我拍手贊成。

柳子生命中的女性

黃虹堅

自若集

一名古代士人生命中的女性，是高堂大人他的娘親，是枕邊人他的妻妾，再就是下一代他的女兒，還有就是他的情人相好、紅顏知己。

柳宗元政治抱負甚高，受「永貞革新」失敗之累，一再受貶受辱，這些已被史家一寫再寫；其文學成就，也躋身「唐宋八大家」而蓋棺定論，被永久頌揚；但其男女情事卻慳於筆墨，堅守着不能說的秘密。在中唐等級森嚴、門第考究的封建社會，貴族與平民姻緣難結。門不當戶不對的感情，未必能見光的關係，坊間恥於說或規避說，柳子則羞於說或愧於說，他的友好及仰慕者因「爲賢者諱」而緘言不說。所以與柳子交好的女人，只偶爾像影子般在他身邊晃悠。史家只能從其詩文或其他文字中穿針引線，勾勒出那些女性的輪廓。

說到柳宗元生平，最有力的依據是韓愈撰寫的柳子厚（「子厚」，柳宗元「字」）墓誌銘。墓誌銘通常只是一兩句言簡意賅的話，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作曲者聶耳的墓誌銘，就是法國人的一句詩：「我的耳朵宛如貝殼，思念着大海的濤聲」。資產階級啓蒙思想家盧梭的墓誌銘是：「睡在這裡的是一個熱愛自然和眞理的人」。韓愈卻撰文千餘字，譯成現代漢語近二千字，說是悼文比墓誌銘更恰當。

韓愈在悼文中寫到了柳宗元的家世生平，讚揚其才能，論述其政績和文學建樹，特別稱頌他與劉禹錫間肝膽相照的情義。其中一段文字借題發揮，刻畫了勢利小人的嘴臉，實是全文的華彩樂章。

劉禹錫文學上也成就卓著。他的《陋室銘》曾編進香港中學的文學教材，一句「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該是受過教益的中學生開口能誦的。劉禹錫與柳宗元同爲「永貞革新」的親密戰友，又同遭厄運由京官貶爲荒蠻之地司馬。柳子臨終，把編纂出版著作及養育遺孤的心願付託四位朋友，其中劉禹錫在出書上最爲給力，他把柳子長子周六視如己出，將之撫育成人。

韓愈在悼文中提到了這個周六：「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

文中未見女兒名字，更一字未提爲柳宗元生子育女的那個女子。封建時代「男尊女卑」的觀念，在韓愈這種相對前衛的士人身上，表現也是如此的赤裸。

那麼，柳宗元生命中都曾有過哪些女性？

首提的該是他的母親盧氏。她出身沒落官宦人家，柳子自小得益於她的言傳身教，學識品格也始於她的啓蒙。柳子落難永州時，盧氏已六十有七，卻毅然隨子上路。及至永州，身體諸多不適，想來也是爲兒子帶罪而鬱悶，不到一年便病故。柳子認爲是受己所累，愧憾終生。

柳宗元明媒正娶的妻子，楊姓，也是名官二代。柳子對這段門當戶對的婚姻極爲看重，未因楊氏腳部有疾而嫌棄。文字記載楊氏曾懷柳宗元骨肉，但未能順利分娩，婚後三年便去世。柳子對妻子家庭保持着終生敬重。岳父去世時，他已在柳州當刺史，與楊氏婚姻也結束十餘年了，但仍深情撰文致哀，讚揚前岳丈的德政，懷念亡妻的情分，自述楊氏死後十八年的悲苦：「家缺主婦，身遷萬里。謗言未明，黜伏逾紀」。

但柳宗元十餘年前離長安往永州時，名喚「和娘」的五歲女兒隨行，若柳子一直「家缺主婦」，未娶而獨鰥，又如何得和娘此女？

永州人流傳說，柳宗元在長安有一名「玩得很好」的女子，這該就是和娘的娘親了。

和娘身體不好，柳宗元把她託付給廟中和尚，邊治病邊唸佛吃齋，但終熬不到十歲。傳說和娘墓在永州東城門外西隅，現已無跡可尋。柳子爲愛女親撰的《下殤女子墓磚記》，證實和娘確葬於永州東邊，同時也帶出了兩點重要信息：「下殤女子生長安善和里」；「其母微也，故爲父子晚。」史家由此解讀出，和娘生於長安；生育她的女子，出身「微」也，導致柳宗元較晚才公開與和娘相認。後人猜想和娘生母或是出身引車賣漿之家，甚或來自煙花之地。也有史家猜測她可能是楊氏婢女。章士釗老更在其《柳文指要》中指出：柳宗元「蓄妓於家」，認爲那些妓便是柳宗元的妾。和娘之母的身世傳說多端，但都被社會視爲與柳子不屬同一世界，所以便按下不表了。史上無一字記錄那名女子的出身相貌、未可跟隨永州的苦衷及與女兒分離的痛苦。我們只能想像她也許曾慰藉過柳子妻亡的歲月，但無名無份，始終只是湮沒於蓬蒿的無名氏。

柳宗元到永州後的婚姻又如何？永州朋友告知當地百姓曾推舉一位德行賢淑的女子馬儀（「儀」該是「姨」的諧音之誤）照料柳子生活。史家分析那就是柳子的同居女友。柳宗元所撰的《馬室女雷五葬志》中提到「以其姨母爲使於余也」，人們推測雷五的姨母便是柳家家奴或蓄妓，也就是柳子事實婚姻的妻子，她可能就是韓愈提到的周六、周七及二女之母。也是礙於那女子身世微寒，難與士族高攀，故史上也不著一字。

柳宗元在其另一篇《送表弟呂讓將仕進序》，自稱「內弟」，令人疑心他娶的是呂家之姐。但也有史家反駁：柳與呂同爲士人，政治上又志同道合，實無必要隱忍這段婚姻。所以那稱謂只言明了「表」的親戚關係，呂氏也許從來就未存在過。也有一說謂馬雷五的姨母馬姨，與呂氏同爲一人。

楊氏歿後，柳宗元身邊其實不缺女人，但他始終謹慎，未正面提及那些女子，筆下流出的片言隻語，引起後人諸多推考，卻也只能描劃出他的影子夫人。故也有憤慨之人痛批柳宗元是僞君子，表現不如同代的白居易和元稹。這二位結交的女子包括青樓妓女不可謂不多，風流艷事可是不吝於筆下的。但柳宗元受制於時代觀念，其曖昧躲閃不必用現代理念去求全責備。只遺憾柳子生命中的女人，許多眞相只能是千古之謎了。

柳宗元的拘泥，叫後人無幸讀到其愛情題材的纏綿詩文，留下了他男性生命的一點空白。若能衝破束縛去揮灑，以柳子的才華天分，其愛情詩篇的成就，或會比情詩高手元稹們技高一籌呢！

柳宗元塑像　Jean攝

必誠必信

夏禹

文史叢譚

「五卅」慘案期間，日本《每日新聞》爲蒙蔽世界輿論，於華人慘被殺傷未見詳述，連日刊載該報上海特電之無根據謠言：「英警官二名、義勇隊二名即死」，「英國義勇隊員二名在河南路被學生軍捕擄」。一九二五年六月八日《新聞報》載文指出，報紙之宗旨或各有不同，而紀載事實應守誠信則萬國所同不容稍異，責問《每日新聞》何以變亂事實至於如此。

二千年前的《春秋穀梁傳》有一至理名言：「人之所以爲人者，言也。……言之所以爲言者，信也。」（僖公二十二年）明確語言是人區別於其他動物的本質特徵。藉助語言，人們對於在社會實踐中獲得的豐富感性認識分析綜合，由此入彼、由表及裡、去粗取精、去僞存眞，實現對於客觀事物間接、概括的反映，揭示不能直接感知的事物本質和規律，形成思想。一切根據和符合客觀事實的正確思想，推動、促進客觀事物的發展；不根據和不符合客觀事實的錯誤思想，阻礙、破壞客觀事物的發展。信，就是符合客觀事實、反映客觀眞實。語言作爲最重要的交際工具是社會發展的產物，又是社會發展的重要工具。信，是語言區別於其他人類行爲的重要特徵。「其身歿矣，其言立於後世，此之謂死而不朽。」

「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禮記・檀弓上》）誠，眞實、無妄、無欺，尤指心意的眞實，與指客體眞實的信有所區別。言爲心聲，言由心生。誠是信的必要前提；信之所本在誠。自謀不誠則欺心而棄己，與人不誠則喪德而增怨。無信，患作失援，必斃。至誠則金石爲開。推人以誠則不言而信。修身處世一誠之外更無餘事。

「先生貴誠信。誠信者，天下之結也。」（《管子・樞言》）貴誠信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理念和優良傳統。誠信不僅是修身處世的根本，亦是「結固天下之心也者」。

「小利害信。」（《管子・問》）人們往往見利忘義，罔顧事實。惟信者不食言以從利。臨利財而不見信者，人必不信也。

誠信是做人的基本準則，是社會發展的要求，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倡導誠信，以誠信爲重點加強個人品德修養，形成修身律己、崇德向善、禮讓寬容的道德風尚和守信光榮、失信可恥的社會氛圍，促進社會各個領域的誠信建設，結合孝悌慈愛、勤奮創新、公平公正，促進家庭道德、職業道德、社會公德的生成發展，將是今日中華道德復興必由之路。道德復興是中華復興的重要前提，是中華復興充分且必要的條件。

不能造朝

嚴　陽

文化經緯

「不能造朝」，也就是「不能上朝」的意思：昔日，孟子準備去朝見齊王，正好齊王派人來召見他。結果孟子反而改變主意了，以「不幸而有疾」爲藉口，告知齊王的使者我「不能造朝」。即便是後來他的家人以及大夫景丑好說歹說，也都沒有能夠改變他的心意。他對大夫景丑最後說的一句是：湯王對伊尹、桓公對管仲，都不敢隨意召喚，何況不屑做管仲的人呢？

這段往事，記載在《孟子・公孫丑下》中。

在《孟子・公孫丑上》中，當公孫丑拿管仲和孟子相比較的時候，孟子就已經表達過自己這樣的態度：不屑與管仲相比。由此足見，孟子的自我評價還是相當高的。當然，自我評價是一回事，而歷史或者說第三者的評價則可能是另外一回事。當時光流逝了二千多年後，當我們可以站在歷史長河的高岸上遠眺的時候，那麼，這樣的評價或許是較爲客觀的，那就是：就政治才能而言，管仲無疑遠高於孟子，是他幫助齊桓公建立了成爲「春秋五霸」之一的偉業；但就學說、就思想方面來說，孟子的影響無疑更大，是他讓儒家學說得到了發揚光大，最終成爲中國社會的主流文化，深刻地改變了中國人的文化心理，影響了中國後來的歷史。

不過，我們在這裡更感興趣的其實不是孟子的自我評價，而是作爲中國最早的公共知識分子之一的孟子，在面對王權、面對齊王這樣的政治強人的時候，表現出的獨立意識，也可以說是文人的骨氣。

客觀地說，齊王對於孟子這樣的知識分子還是表現出一定的尊重的。比如說，他召見孟子採取了十分委婉很給面子的說法：我本來應該看望先生的，但是不幸染上了風寒，不能吹風。明天早上上朝，不知道先生是不是能讓我見到你？又比如說，在孟子聲稱自己染病不能去上朝見齊王之後，齊王不只「使人問疾」，而且同時還派了「御醫」過來——固然此舉有探聽虛實的用心，但大概也無法排除其確實關心的可能吧？並且齊王最終並沒有追究孟子「裝病」的責任，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齊王還是比較寬容和理解孟子這樣的讀書人的。

就是面對這樣的齊王，孟子依然一副愛理不理、十分清高的模樣，其內心到底是怎麼想的——除去已經說出來的，也是能夠說出來的之外，是不是還有些沒有說出來的、也是不能說出來的呢？我們就不知道了。但是，這種在權力和地位面前保持自身的獨立、人格與尊嚴的做法，無疑是很值得今天的讀書人欽佩與學習的。

社會的進步和發展離不開知識分子，國家治理也需要知識分子的知識和智慧。所以，國家和社會予以知識分子必要的地位和尊重是理所當然的事。而作爲知識分子自身，無論是做學問還是議論國是，乃至爲國家大政方針的出台、修正提供其所需的決策參考，是保持應有的獨立性、科學性，還是崇尚權力、滿足於加注、點讚，烘雲托月，是很值得深思的一件事。而眼下公衆習慣於將「專家」稱做「磚家」，「教授」稱做「叫獸」，固然有些不恭與誇張，可作爲知識分子的我們，有沒有想過這背後的可能的原因呢？